

# 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结

丁晓, 沈松勤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作为“触媒”,北宋党争激活并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使之产生陶渊明情结;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陶渊明重新进行了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注入到陶诗冲淡平和的外壳中,体现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并使其得以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关键词]** 朋党之争;历史记忆;和陶遣情;重新建构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3)02-0111-09

被贬黄州后,苏轼成熟于熙宁年间的以汪洋恣肆、“灏气旋转”为特色的创作气质似乎被刻意淡化了,而“效陶之平淡,相济而成温厚之音”<sup>[1]</sup>(p. 1814)的创作倾向则渐显端倪,并由此创作了《东坡八首》等习陶诗。此后,这一陶渊明情结不断深化,元祐七年扬州任上,苏轼始和陶诗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绍圣被贬岭南期间,则进一步集中创作了大量和陶诗。苏轼一生共留下了124首和陶诗、10首《归去来集字》、1篇《和归去来辞》及大量间接模仿陶诗冲淡质朴风味的作品。

然而,这部分习陶和陶之作却有违其固有的创作气质。正如后世学者所说:“虽其高才,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sup>[2]</sup>但苏轼自己却似乎对其“几遍和陶诗”的行为看得很重、自视很高:“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sup>①</sup><sup>[3]</sup>(p. 1110)对此,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苏轼如此深情地去追和陶渊明?在其陶渊明情结产生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更深刻的时代需求?苏轼之习陶和陶是仅仅对陶渊明诗风、题材、语言的模仿,还是对陶渊明人生态度的一种崇尚?如果是后者,那么,苏轼是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陶渊明,还是对这一历史遗产进行了某种重构?

任何一种既有的精神和思想资源都不能从其存在的那刻起就绵延不绝、主动地影响后世,更多时候,它只是沉睡在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下的沙砾,其“影响”是否能重新浮现在人们注目处,完全取决于当下的现实处境是否需要并足以唤醒这部分历史记忆。对于苏轼来说,元丰年间的乌台诗案正是这样一个现实“触媒”(accelerant),猛然激活了他对陶渊明这一精神资源的历史记忆。而元祐年间的蜀洛党争和绍圣以后的“绍述”党锢,则又不断促使这一记忆进一步深化。

**[收稿日期]** 2002-06-05

**[作者简介]** 1. 丁晓(1979-),女,浙江余杭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 2. 沈松勤(1957-),男,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① 此为苏辙引苏轼语。

熙、丰年间,苏轼始终站在新党的对立面,指责新法之非。随着新法推行力度的不断加大,旧党政治地位的急剧失坠,苏轼的措辞也愈显偏激,甚至诅咒“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激起了神宗的强烈不满。因深知自己“猖狂不逊,忤陛下多矣”<sup>①</sup>,熙宁四年底,苏轼请准外任,通判杭州,后移知密、徐、湖州。外任期间,苏轼依然沿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4](p. 10809)的思想惯性和创作积习,“见事有不利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5](p. 1120),写下了一系列“怒邻骂座”[6]、排击新法的诗文。如:“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半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至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诏解忘味,迩来三年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形成了一套有悖于皇权政治的话语系统,与主流话语中心相抗衡,并且以其文名、诗艺之高,传于人者甚众,给新政的深入推进在意识领域里造成了严重阻碍。面对这种“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的现实形势,执政者看到要顺利推行新法必须首先“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7](p. 85),采取必要的集权措施,强化君权对舆论的控制。因此,以勘治苏轼讥刺新法的诗文为内容的乌台诗案遂应运而生。

乌台之勘使苏轼长期张扬的儒家思想趋向黯淡。一出狱,苏轼便对先前峥嵘外露、以经世济民为价值体系的群体主体思想深自追悔和反省。他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8](p. 1005)贬黄期间,在《答李端叔书》中也写道:“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说说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掺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9](p. 1432)在否定以往多言说说的创作倾向同时,加深了内里工夫的修炼。

另一方面,儒家经世济民价值体系的黯淡,又促使苏轼对个体主体的情感、自由和价值加以重新认识。在狱中,“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死亡的临界体验,唤醒了他那一直沉睡在群体主体之下的生命意识,唏嘘“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8](p. 1005)。贬居期间,又几番经历了生死永别,进一步参悟到生命本真的意义,从群体主体退回到个体主体:“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袞袞多言矣。”(《答秦太虚八首》其四,卷五二,第1535页)生命意识的猛然觉醒,使此时的苏轼转为对平凡人生自由和温暖的渴求:“此书到此,相次,岁猪鸣矣。老兄嫂因坐火炉头,环列儿女,坟墓咫尺,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与子安兄七首》其一,卷六〇,第1830页)

这种群体主体的忽然失坠,使苏轼不得不急于寻找某种新的精神材质,以重组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生活状态的极度逆转、个体主体的痛苦觉醒,又使他渴望能够借助某种力量来排遣沉重情累,找到个体生命的自在律动;谪居黄州的躬耕生活,则使苏轼首次真切地体味到陶诗中自然界纯真和谐、自在无争的境界:“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荒唐也。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麀糟坡里陶靖节,如何?”(《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卷五二,第1521页)可见,正是现实

<sup>①</sup> 参见《苏轼文集》卷二五《再上皇帝书》,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引《苏轼文集》皆出此版本,仅在引文后标注篇名与卷数、页码,不再另注版本事项。

处境的这一逆转,唤醒了苏轼对于“阅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的陶渊明的历史记忆,并由此产生了再也无法解开的渊明情结。元丰五年,苏轼在《书渊明饮酒诗后》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履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此渊明《饮酒》诗也。正饮酒中,不知何缘记得许多事?”同期,又在《江神子》中发出了“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的喟叹。显然,在苏轼的世界里,现实遭遇仿佛已经与历史事件交互重叠,而现实人物也和历史形象合二为一了。

元祐年间,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原来在野或被贬的旧党成员再度还朝主政。但是,基于学术和具体政见的分歧,在共同协作倾轧新党势力的同时,旧党内部却又很快裂分为朔洛蜀三党,“诸党相攻击不已”[10](p.146)。作为蜀党领袖,苏轼始终处于新旧党争和朔洛蜀三党互斗的核心旋涡之中,沉浮不定:“始论衙前差顾利害,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因亦与司马光异论。光初不以此怒臣,而台谏诸人,逆探光意,遂与臣为仇。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自朝廷废黜大奸数人,而其余党由在要近,阴为之地,特未敢发尔。小臣周穉,乃敢上书乞用王安石配享……是以上书逆折其尖锋,乞重赐行遣,以破小人之谋。因此,党人尤加忿疾。其后,又于经筵极言黄河不可回夺利害,且上疏争之,遂大失执政意。”(《杭州召还乞郡状》,卷三二,第912、913页)“二年之中,四遭口语,发策草麻,皆谓之诽谤。”(《乞郡劄子》,卷二九,第827页)元祐四年,又在“近日台官论奏臣罪状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许臣外补”(《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卷二九,第838页)的背景下,被排挤出朝,外出知杭。随着元祐党争意气化倾向的愈演愈烈,“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卷五二,第1526页)。一股浓烈的“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则危亡是忧,国何由报”(《乞郡劄子》,卷二九,第827页)的危机感,便涌上了苏轼心头。

虽然在“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各位禁林”的殊遇下,苏轼始终以“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的姿态,怀抱“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杭州召还乞郡状》,卷三二,第912页),“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论边将隐匿败主宪司徒谅不实劄子》,卷二九,第836页)的报国壮志,但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现实气氛中,退隐情绪却依然迅速在他内心滋长。这一时期的书信奏章中,苏轼常常流露出对因言犯事的惧怕:“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日以岌岌……尤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卷四八,第1399页)“至于诗赋赞咏之类,但涉文字者,举不敢下笔也。忧患之余,畏怯弥甚,必望有以亮之。”(《答李方叔十七首》,卷五三,第1580页)甚至产生了“以荣为惧”、“以进为祸的扭曲心理:“今者忽蒙圣恩召还擢用,又除臣弟辙为执政……闻命悸恐,以福为灾。”并屡屡上札乞郡“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全余年”(同上,第1580页):“少时忘意,盖尝有志于事功;晚岁积忧,但欲归安于田亩……力求闲散,庶免颠挤。”出任与归隐,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尖锐对立却又无法分割,造成了苏轼这一阶段思想的矛盾复杂性。

元祐六年,洛党贾易等据苏轼在扬州所作《归宜兴留竹寺》一诗,炮制了扬州诗案,弹劾苏轼因“迁谪之故(指被贬谪黄州),忻幸神宗上仙而作是诗”,要求立案勘治[11](p.96),欲置苏轼于死地。虽经苏轼辩解,未能立案,但这一事件无疑加深了他“畏怯弥甚”的心理,使他进一步失去了熙、丰中初涉政坛的奋不顾身的风发意气,陷入到晦黯茫然的状态中,而这正与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中流露出来的矛盾复杂的心态相仿佛。《饮酒二十首》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二三年,时值晋宋交替,从“道丧向千载”、“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中,可以窥见时局的黑暗混乱;从“一世皆尚同”、“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中,又足见当时士人随风披靡的恶劣性格。所以,陶渊明在序中云:“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饮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

数句自娱;纸墨遂多,无以谗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虽为备述饮酒之乐,实则是以酒寄慨,笼罩全诗的是一种矛盾、迷惘、灰黯的情绪。正是在这种相似的背景下,陶渊明又一次浮现在苏轼的脑海中。元祐七年,苏轼外任扬州,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序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在这组诗中,同样回旋着一股矛盾心绪。显然,在“当官不避事,无事辄径醉”(苏辙《和子瞻饮酒二十首》其十五)的外任生活中,苏轼试图效仿陶渊明以放歌饮酒、唱诗作和来淡化内心的沉郁,麻醉矛盾痛苦的心灵。

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绍述”熙丰新法,一时间风云遽变,“中外议论汹汹,人怀顾望,在位者畏惧,莫敢发言。”[12](p. 10797)昔日凭借高太后这一强大后台对熙丰新党肆意打击倾覆的元祐党人,面对新党的复起,预感到自己命运即将面临沉沦。

同年九月,苏轼便外任定州,因其“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却“不得一面天颜而去”,上书云:“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主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卷三六,第1019页)这类看似谏语的文字背后,透出的却正是元祐旧党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惊悸和担忧。很快,这种担忧便成了事实:绍圣元年四月,苏轼自定州黜知英州;六月,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四年闰二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同时,大批元祐党人亦先后被流放到了岭南远恶州军,形成了对元祐旧党的全面党锢。面对年事越来越高,而谪所却越来越远,政治环境亦越来越险恶的状况,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情不自禁地哭述出对老死穷荒的极度悲恐和与子孙死别的无尽凄凉:“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别。俯伏流涕,不知所云。”如果说,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虽因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苦闷,尚不能忘却事功之心的话,那么此时,在先前的苦闷中则又多了一份浓重的贬中忧生的情累。而当苏轼自以为“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患人,渐作久居计”(《与孙志康二首》其二,卷五六,第1681页)时,直逼而来的首要命题,便成了如何才能彻底忘却那段令人“长恨此身非我有”的党争生活?如何才能自我镇定而不至于被这浓重的情累所压垮?如何才能在这种苦雨瘴烟的贬居环境里使生命得以延续,而不致于过早地凋谢?于是,曾两次伴随他走过党争风云的陶渊明已然成了苏轼重要的精神支柱。苏轼将其人生态度内化为自身的处穷哲学,纳于自己重新建立的思想体系之中:“流转海外,如逃空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十二首》其十一,卷五五,第1627页)他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中记道:“‘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海关。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绍圣二年二月十一日,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兀然如睡,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卷六七,第2115页)在这场不可清醒的梦境里,正是陶渊明其人其诗,使苏轼得以清醒地反观己身和现实处境,在这一处境下,苏轼作出“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的决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 二

历史上的陶渊明形象是丰富的、立体的:既有其旷洒脱、冲淡和缓、“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

有其沉郁顿挫、“带气负性”<sup>①</sup> [13] (p. 3327)、“猛志固常在”的一面。正如鲁迅所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总不能超于尘世,也不能忘掉‘死’。” [14] (p. 506) 然而,有意思的是:浮现在苏轼视野中的陶渊明却丧失了其原有的历史真实性和复杂性,在绝大多数时候,那个客观存在的冰炭满怀的陶渊明形象,似乎被刻意地压抑和抛弃了。

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中,苏轼有一段影响深远的点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深,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这就不单纯是个版本异文的问题,正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评苏轼“见”字说》所云,而是在更深的层面上折射出苏轼对陶渊明人生态度中“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这一面的选择倾向。对此,苏轼又直接从陶诗中加以概括:“秋菊有佳色,邑露掇其英。泛此无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聊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飞鸟趋林鸣。啸傲东窗下,聊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自适为得此生,则凡役于物者,非失此生耶?”(《题渊明诗二首》其二,卷六七,第2019页)反过来,对这一人生态度的追慕,又影响到他对陶诗风格中平淡、自然一面的极度推崇和追求,进而将其列于古今诗人之首:“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 [3] (p. 1110) 终至于违拗自己的创作特质而写下了大量的习陶和陶诗。可见,苏轼始终用自己的语言在诠释历史的陶渊明,试图在自己的幻想中重构一个恬淡适真、乐易无累的完美偶像,并将其作为某种精神材质,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思想”(ideas)是人类对于他们本身所处“环境”(situation)的“有意识的反应”(conscious responses) [15] (p. 101)。当下的现实环境在唤醒一部分记忆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压抑着另一部分记忆。面对“旋加诸膝,旋坠诸渊”的外界党争环境,如何维系内心的释然超脱和乐易无累,实现个体生命的自在律动,已成为有宋一代的强烈需求,这一方面激活了苏轼和其他宋代士大夫对陶的历史记忆,一方面又决定了他们对这一记忆的选择维度。晁补之在《鸡肋集·释求志》中云:“马融、张禹、靡相荣,以车马夸弟子,皆不足言。陈蕃、范滂、王允、李膺、李固以忠杀身,亦可伤矣。夫惟无心于为者,为能为天下,张良、四皓所以成也;知其不可而不为,则若林宗、渊明可矣。”辛弃疾在《沁园春》中云:“记醉眠陶令,终至全乐;独醒屈子,未免沉灾。”面对群体主体在党争中遭受重创,个体主体又将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前者否定了传统儒家所崇尚的“舍生取义”之路;后者则否定了自屈原以来,被嵇、阮一路传承的“愤死”之途,转而从陶渊明身上汲取“知其不可而不为”、只关注个体生命自在律动的处穷态度。《蔡宽夫诗话》云:“观其(陶渊明)《贫士》、《责子》与其他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可见,在特定环境下被记起的陶渊明,普遍被宋人意象化、概念化了,陶渊明已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代表了北宋士人所追求的夷旷洒脱、任真自得、乐易无累的处穷态度;而陶诗中萧散冲淡、恬静和平的田园主题和诗中所刻画的那种“躬耕非所叹”、“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旨趣和情调,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胶扰于党争的北宋士人用以排遣情累的精神家园。

同样,当苏轼作为党争的失败者从政治中心被挤兑到政治边缘时,陶渊明正如那“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雪堂记》,卷一二,第410页)的东坡雪堂,作为某种处穷药方浮现在其注目处,使苏轼得以将生命的凝重寄于文学的轻灵之上。所以,从苏轼在黄州时期始效陶诗冲淡自然诗风而作的“八篇皆田中乐意语,如陶渊明的《东坡八首》,一直到后来创作于惠、儋谪所的一系列“其意不肯说坏海南……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全以乐易为意” [16] (p. 1807) 的习陶和陶诗中,我们能感受到的便仅仅是一个“悠然见南山”式的陶渊明。

① 朱熹曾指出: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奇。

既然苏轼所追崇的陶渊明只是其为寻求处穷之路而在自己意识中重构的幻象,那么,他的习陶和陶诗在本质上也必然沾染了自己特有的生活哲理、情感体验和人生境界,必然继承了有宋一代发展而来的独特的处穷精神。正如王文浩所言:“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至于其诗,极有区别。有作意效之,与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适与陶相似者;有借韵为诗,置陶不问者;有毫不经意,信口改一韵者……盖未尝规矩于学陶也。”[17](p. 1722)因此,滞留在和陶诗与原诗的文本表相之上,胶着于对两者似与不似的争论之中,就不免颇有“隔靴搔痒”、“买椟还珠”之嫌。我们似乎更应该沉潜下去,剥开和陶外衣,从“不似处”窥探苏轼将历史遗产和时代精神重组后形成的独有的处穷哲学。

首先,由于陶渊明和苏轼身处时代背景的悬殊,两人在对待现实生活的根本态度上有着本质区别。如果说,陶渊明在士人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晋末最终选择了一条无政府主义的避世之路,那么,生活在士人地位被空前抬高、主体精神被高度激扬的宋代,面对多舛的命运和惨淡的谪居生活,苏轼却为中国的处穷文化提供了另一条汲汲进取、拥抱现世的道路。

在中国的处穷文化中,避世主义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期,劳动人民面对难以为继的生活境遇,或萌生出逃避现实社会的念头:“匪鸛匪鸞,翰飞戾天。匪鱣匪鼈,潜逃于渊。”(《小雅·四月》)或渴望找寻一片憩养身心、自在自适的乐土:“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而一批知识分子则因不满法术纵横家云起、征战频仍的社会状况,隐世埋名,远离现实,宁愿过艰苦的隐士生活,却不肯干预世事,正如孔子所说的,“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转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遗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篇》)这种对现世风云惘然漠视,将世俗生命寄托于天地精神的思想萌芽,对魏晋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渊明曾在《感士不遇赋》序中唏嘘:“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间阎懈廉退之节,市朝趋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产生了浓烈的避世情绪。他在《饮酒》其五中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显然,为了维系内心的平静,陶渊明试图深深地退避到个人的小天地中,用层层坚硬的心壳将自己与外界的动荡纷争完全隔绝,从个体无法伸展的现实社会中逃遁开去。而在《桃花源诗》中,陶渊明又通过对“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的营造,进一步将这一避世心态具象化了。然而,这并未能解决陶渊明面临的现实矛盾,诗末“借问游方士”、“愿言蹑轻风”的游仙语,晦涩地暗示出诗人因这一理想境界无处寻觅而生出的无奈心绪。

然而,苏轼所经历的纷扰反复的朋党之争,归根到底却是北宋王朝在大一统局势下在内部进行的某种政策和权力调整。作为既是文学主体,又是参政主体的北宋士人,苏轼虽在仕途上命运多舛,但对于身处的时代却始终充满了自豪之情和汲汲进取的精神,因而绝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抱有坚决的避世思想。苏轼曾反用《论语》里桀溺对子路说的话:“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已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他写道:“我虽爱山亦自笑,独往神伤后难继。不如西湖饮美酒,红杏碧桃香覆髻。作诗寄谢采薇翁,本不避世哪避人。”(《自普照游二庵》)追求一种“平地家居仙”[18](p. 1610)式亦官亦隐的生活模式。即便是身在岭南、北归无望的处境下,苏轼依然没有对现实生活放弃过希望,依然保存着对宋王室的感激之情,并创作了像《和劝农》这样“以告有知者”的采风诗,还在和陶诗中表达了“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示周缘祖谢和游城东学舍作》)、“常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和杂诗十一首》其九)的事功之心。

所以,对于陶渊明那种逃离现实、躲入虚幻的处穷态度,苏轼自然不会赞同。在作于绍圣三年的《和桃花源诗》里,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指出想要遗世独立是不真实的空想。虽然,他一边还是钦佩“子骥虽形隔,渊明已心诣”,但一边却全然否定了陶氏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却笑逃秦人,有畏非真契。”与陶渊明相比,苏轼直面厄境之勇气是何等决绝、何等豁达。

再看苏轼针对陶潜《神释》而作的《问渊明》:

子知神非形,何复异人天。岂惟三才中,所在靡不然。我引而高之,则为日星悬。我散而卑之,宁非山与川。三皇虽云没,至今在我前。八百要有终,彭祖非永年。皇皇谋一醉,发此露椋妍。有酒不辞醉,无酒斯饮泉。立善求我誉,饥人食饘涎。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应尽便须尽,宁复事此言。

这又昭示了苏轼在接受陶潜“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自然体道思想基础上,抛弃了那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逃避漠视态度。在苏轼看来,忧患与生俱有:“委运忧伤生,忧去生亦还。纵浪大化中,正为化所缠”,关键是要以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和对生命的眷恋之意,去拥抱大化中的喜与惧。在《和陶连雨独饮》中,苏轼亦借用汉贾谊《鹏鸟赋》中所言祸之与福何异纠缠之意,毫不回避人生的祸难,惟希望“纠缠不吾欺,宁此忧患先”。所以,他的“应尽便须尽”不同于陶渊明的被动,是一种直面人生忧患的积极的生命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其次,陶渊明对故园始终怀有强烈的眷恋之情,在诗文中常常咏叹:“园田日梦想,安可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四首》其一)在《归去来兮辞》中,则洋溢着对重返故园,“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无法克制的喜悦之情。在陶渊明眼中,故园是纷乱现实的反面,对现实的强烈失望便转为对故园的苦苦执着。然而,不同于陶渊明的这种“留意于物”,在庄子委运自然的精神遗产和北宋独特的处穷文化熏染下,苏轼在遭贬处穷历程中,不断深化和发展起了另一种应物无累的思想境界。

早在嘉祐四年赴京赶途中,苏轼就写下了“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这类诗句。熙、丰年间,又对此一再阐发:“夫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隆则与之偕升,物污则与之偕降。”(《道有升降政有俗革》,卷八,第173页)“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啜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卷一一,第351页)“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荣。”(《宝绘堂记》,卷一一,第356页)

如果说,乌台诗案之前,苏轼这一“应物”思想还只停留在感性层面,那么,随着党争生活的跌宕沉浮及对自己镇定的深入体验,这一思想便逐步内化为苏轼的人生哲学,指引他从贬中忧生的沉重情累中摆脱出来。元丰二年,苏轼被贬黄州,第一次将这一“应物”思想真正转化为人生实践:“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与范子丰八首》,卷五〇,第1453页)“吾兄弟俱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卷六〇,第1832页)元祐在朝期间,面对“旋加诸膝,旋坠诸渊”的难以把握的党争命运,苏轼在深深喟叹“虽去轩冕,避津要,所欲闲耳,而不可得,乃知吾道艰难之际,仁人君子拾众人所弃,犹不可得”的同时,又立即以“应物”思想加以消释:“然忧喜劳逸,无非命者,出办此身,与之浮沉,则亦安往而不适也。”(《答范景山》,卷五九,第1794页)始终努力用一种超脱无累的态度去坦然接受党争可能带来的任何打击。

也正是这种思想铺垫下,绍圣年间,当苏轼于垂暮之年被贬岭南死地时,面对“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霖雨不止,顾视帷帐,有白蚁升余,皆以腐烂”的恶劣环境,虽然一时亦“俯伏流涕”、“不敢梦故山,恐兴坟墓悲”(《还旧居和梦归惠州白鹤山居作》),但很快便表现出更为胸无芥蒂、委任自然的通透姿态:“某睹近事,已绝北归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说妙理达观,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十三,卷五四,第1593页)“(儿女)既不在目前,便与之相忘,如本无有也。”(《与王庠五首》,卷六〇,第1820页)并从辩证、运动的自然界中体验生命的自在和生生不息:“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

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僂耳颇有老人,年有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庄子曰:‘天之穿之,日夜无隙,人则固塞其窠。’岂不然哉。”(《书海南风土》,卷七一,第2275页)

所以,在《和归去来兮辞》中,苏轼从陶渊明对故园的胶着中解脱出来,在其原有的“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超然台记》,卷一一,第351页)的“应物”思想上,发出“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及“归去来兮,请终老于斯游。我先人之鄙庐,复舍此而焉求。均海南与漠北,契往来而无忧……已矣乎,吾生有命归有时,我初无行亦无留。驾言随子听所之,岂以南华而废从安期”的达观之语,将谪所视为自己的故园。在《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写道:“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鸠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这种思想在苏轼的《和岁暮作和张常侍》一诗中亦有阐述:

我生有天禄,玄膺流玉泉。何事陶彭泽,乏酒每形言。仙人道士,自养岂在繁。但使荆棘除,不忧梨枣愆。我年六十一,颓景薄西山。岁暮似有得,稍觉散亡还。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缠。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

苏轼不屑于陶渊明“乏酒每形言”的“留意于物”,亦不赞同“仙人”“道士”烦琐的养生规矩,觉得只要将困扰内心的“荆棘”剔除干净,将事业功名这类“弱蔓”完全抛却,自然“会有解脱年”。而“不醉亦陶然”正集中体现了苏轼不委于外物而自求安适的处穷态度。

正是借助了这种直面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应物无累”的生命意识,苏轼得以在苦雨瘴风的谪居环境里达到自我镇定、自我慰藉,在“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的自我救孰中,激起“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辉”(《和陶王府军座送客》)、“养我岁寒枝,会有解脱年”的憧憬。而表现在和陶诗中,也正如戴第元在评苏轼《和陶拟古九首》中所云:“此东坡在僂耳和陶之什。题虽云《拟古》,皆言岭南风土,谪居实事,与从前多做寓言者不同。”[19](p.1804)

综上所述,苏轼的陶渊明情结的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纯文学领域的现象,而是北宋党争催化下的特殊产物。作为“触媒”,乌台诗案、蜀洛党争、“绍述”党锢先后激活和深化了苏轼对陶渊明的历史记忆,同时,在社会背景、文化结构和时代接受心理的共同影响下,苏轼又根据现实处境的需要对其进行了重新诠释和建构。在习陶和陶过程中,苏轼将自身旷达超脱的精神气质、“穷达之间”亦“绰然有余裕”的社会文化观注入到陶诗清新自然、冲淡平和的外壳之中,形成了特有的直面命运和“应物”的处穷哲理。对于苏轼来说,陶渊明正仿佛是一处平静的水面,使自己得以沉浸其中,以清醒的意识去吟咏映照在水面上的自我和生命的实相,从中排遣情累,自我镇定,达到情感的内在超越和净化。

#### [参 考 文 献]

- [1] 赵克宜. 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卷二〇[A]. 曾枣庄. 苏诗汇评[Z]. 重庆: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 [2] 陶澍. 靖节先生集·附录[Z]. 四部备要本.
- [3] 苏辙. 苏辙集·栾城集·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卷二一[Z].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 脱脱. 宋史·苏轼传:卷三三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苏辙. 苏辙后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卷二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 [6] 黄庭坚. 豫章黄先生文集·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卷二六[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7] 王安石. 王文公文集·答王深甫书:卷七[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8] 苏轼. 苏轼诗集·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二:卷一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 苏轼. 苏轼诗集·答李端叔书:卷四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0] 邵伯温. 邵氏闻见录; 卷一三[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司马光. 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八月己丑”条; 卷四六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1986.
- [12] 脱脱. 宋史·范镇传·附子祖禹传; 卷三三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3] 朱熹. 朱子语类; 卷一四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A]. 鲁迅. 鲁迅全集[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 [15] 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关于中国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A]. 葛兆光. 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 [16] 王文诰. 苏海识余; 卷一[A]. 曾枣庄. 苏诗汇评[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
- [17] 王文诰.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 卷三九[A]. 曾枣庄. 苏诗汇评[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
- [18] 苏轼. 苏轼诗集·王晋卿作《烟江叠嶂图》, 仆赋诗十四韵, 晋卿和之, 语特奇丽, 因复次韵, 不独纪其诗画之美, 亦为道其出处契阔之故, 而终之以不忘在莒之戒, 亦朋友忠爱之义也; 卷三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19] 曾枣庄. 苏诗汇评[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 徐枫]

## Su Shi's Tao Yuanming Complex Under the Northern Song Political Conflicts

DING Xiao, SHEN Song-q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No spiritual and idealistic heritage can influence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automatically until certain “accelerator” appears and pushes the following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o trace back to the remote memories. This kind of recollection is not a simple echo but a result of current atmosphere and certainly has been feathered with characters of the totally different time. Three intense conflicts amo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olitical parties, the Wutai Poem Event, the Yangzhou Poem Event and then the large-scale oppression in the Shaosheng Period pushed Su Shi out of the center of politics and power. It destroyed Su's original mental structure as a traditional Confucian scholar who always believed in “making verses to give the rulers good advice and benefit the nation”. This extroverted official, scholar and talented poet was turned inwards. As accelerators, the three intense conflicts recalled and deepened Su's memory of Tao Yuanming, the well-known poet living in the late Jin Dynasty, who chose to live like a recluse because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was too dark and horrible. On the one hand, by rewriting poems in Tao's original rhymes and imitating Tao's peaceful and plain style, a strong Tao Yuanming complex took root in Su's hear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impact from his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his cultural backgrounds, this historic figure was inevitably re-expressed and reconstructed by Su. Combining the shell of Tao's poems with his own feelings and thought during his political ups-and-downs in the fierce factionalism, Su established his own philosophical construction, and in this series of poems, he gradually evolved and expressed his theory about “directly facing the reality” and “getting free from the rein of the outer-world”, with which Su managed to surpass his terrible mood in exile and maintain a peaceful mind successfully.

**Key words:** conflicts; historical re-collections; restructure